

---

# 日本作家绿川英子的反战斗争

孙金科 于景鸿

---

## 一 从世界语者到反战斗士

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1912年3月7日出生于日本山梨县猿桥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家庭。1929年,在东京府立第三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后,考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经常在学校校友会刊《校友》上,发表短诗、散文等。1932年,是她政治思想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6月她开始学习世界语,与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同盟京都支部有了联系,进而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组织女高师文化小组,参加奈良地方左翼工会、文化团体活动。

在这时期,长谷川照子改名为绿川英子,世界语为 Verda Majo。在世界语里,Verda 是绿色的意思,而绿色又象征着和平、安静;Majo 为五月,而五月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又有革命的意味。“绿色的五月”这个名字,也形象地反映了绿川英子的性格品质。

1932年秋天,奈良地方警察以“具有危险思想”的罪名,逮捕了绿川英子,后在对她保留起诉权到1933年夏的条件下释放了她。她在毕业前三个月,被开除了学籍。

她回到东京后,加入了“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同盟”,参加了以蔡特金名字命名的世界语妇女组织克拉拉会、日本世界语文学研究会的活动。1933年10月,她用世界语节译了小林多喜二著的《蟹工船》,登在《世界语文学》上。1935年4月,她在世界语学会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日本文学小史》一文。同年9月,在《五月》杂志

上,发表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处于何种状态》。同时,她还与中国上海世界语协会建立了联系。1935年4月,上海《世界》杂志发表了她的《日本妇女状况》一文;1936年4月,又发表了她的《日本无产阶级处于何种现状》。

大约在1935年,绿川英子结识了从中国东北辽宁去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的刘仁,并且不顾家中反对,在1936年秋,与刘仁举行了婚礼(没有同居)。和中国人结婚,对她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当时不少日本人,有一种看不起中国人的偏见。连曾在中国领导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鹿地亘也针对绿川英子的婚姻说:有的日本姑娘竟异想天开,找了个中国留学生做丈夫;这个男的,后来成了中国国民党员,而她本人,除了生育孩子,操持家务,充当广播员,还能搞什么反战活动,发表什么著作呢?<sup>①</sup>另外,由于绿川英子本身的反法西斯言行,已引起日本当局注目,她又和有反对日本侵华言行的中国留学生刘仁结婚,这显然是极端危险的举动。

绿川英子和刘仁结婚后,感到在日本难有作为,到中国这个反日本侵略的热土上,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才有意义。她在离开日本时表白说:“如果一个人的平均寿命是五十岁的话,那我已度过了半生。这前半生,我过得庸庸碌碌,而后半生也不可能出类拔萃,因为我是个平凡的女人。然而,我相信并觉得,如果和我留在日本相比,我将能做得多一些,做得有意义一些,因为我是个世界语者。”<sup>②</sup>

1937年1月,刘仁先乘船回到上海。同年4月中旬,绿川英子在中日两国朋友帮助下,乘船秘密离开日本。4月19日中午,绿川英子到达上海。不几天,过去向她约稿的叶籁士等人访问了她,使她和上海的世界语者协会——当时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中心联系上

---

① 鹿地亘:《如火如荼》上册,日本讲谈社1958年版,第55页。按:刘仁一生并没加入过国民党。

② 绿川英子:《在战斗的中国》,世界语函授学社1945年5月版,第32页。

了,并得到他们多方面的援助。来到中国后,绿川英子对中国人民的命运十分关注。她同情那些被赶入关内的东北三省的流亡者;谴责“日军恐怖,烧杀奸掠”;支持东北人民“打回老家去”;赞扬中国志士“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顽强地战斗不息”。<sup>①</sup>

她投身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中。1937年6月,她主动参加了上海人民要求释放救国会七君子的示威游行,和中国人一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步向前。7月,她积极参加了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怒吼》重新出版的编辑工作。她当时兴奋地说:当我拿起笔来时,我由于正义感的不再受压抑而热血沸腾,由于对野蛮的敌人的愤恨而怒火燃烧;我感到高兴,因为我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她于1937年8月写了《爱与憎》一文,她说:“我爱日本,因为它是我的祖国,在那儿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他们我有无限亲切的怀念。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的新的家乡,这儿在我的周围,有着许多善良和勤劳的同志……作为一个世界语者,一个世界文化的爱好者,我愿意保卫中华文明,使它不受强盗魔爪的糟蹋。作为一个妇女,一个人,我本能地渴望和平。但是现在,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加入中国军队,因为它为民族解放而战斗,不是反对日本人民,而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战斗。此外,它的胜利,也将预示着东方光明的未来。同时,我与同志们一起,向日本的兄弟们大声疾呼——别错洒了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sup>②</sup>这篇文章,是绿川英子投身反战斗争的宣言。从此以后,她由一名世界语者变成了反战的斗士。

11月,她在世界语刊物《中国怒吼》上,发表了《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明天的关键——致日本世界语者的信》,号召日本世界语者,起来反对日本侵华战争。她写道:“谁愿意叫我卖国贼,就让他

---

① 绿川英子:《在战斗的中国》,第53、54页。

② 绿川英子:《爱与恨》,载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6月8日第4版。

去叫吧！我对此无所畏惧。我倒为我是那些不仅侵略别人国土，而且肆无忌惮地为无辜也无助的难民们制造人间地狱的人们的同胞，感到羞耻。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从来不会反对人类的进步。”“尽管政府以死相胁，反战运动在日本或已燃烧，或已暗中点燃了……在这次战争里，中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且也意味着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远东所有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它的确是全亚洲和全人类明天的关键”。<sup>①</sup> 载有绿川英子文章的《中国怒吼》等世界语刊物，当时，通过新加坡，转寄到日本，给日本世界语者以很大鼓舞。<sup>②</sup>

上海沦陷后，绿川英子和刘仁乘船离沪，于12月3日到达广州。他们热切地盼望做抗日工作。后由丁克奔走，成立了广东国际协会，绿川英子和刘仁到该协会世界语科，计划出版世界语刊物《正义》。但不久，绿川英子被驱逐到香港，刘仁也随着去到那里。他们在香港过着极其艰难的贫民窟生活。<sup>③</sup> 这时绿川英子完全可以回日本，她的父母，她的有钱的女朋友都等着她回国。但她不肯这样做，而是咬紧牙关，继续为反战运动工作。在艰危的条件下，她把鹿地亘声援中国抗战的文章《真实的正义》，翻译成世界语，并撰写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压迫、剥削日本人民的文章《日本——野蛮统治下的国家》。

## 二 中国的日语广播员

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一时成为中国抗日的政治中心。在汉口，叶籁士向郭沫若诉说了绿川英子在香港的情况，郭沫若深受感动。他推荐汉口《新华日报》在1938年6月8日发表了绿川英子写

---

① 载《中国怒吼》1939年11月第3卷第4期。

② 三宅史平：《两个人的死》，载日本世界语学会会刊《东方杂志》1949年12月号。

③ 当时日本报刊上，说绿川英子在香港曾作对日广播员，这纯系无根据的推测。

的文章《爱与憎》，这篇文章即在武汉引起了轰动。接着，由郭沫若介绍，国民政府同意绿川英子加入中国抗日工作。1938年6月底，由国民政府宪兵护送，绿川英子夫妇到达汉口。当时国民党中央电台需要对日广播人员，郭沫若就介绍她进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担任了对日广播员（此工作一直担任至1940年夏天）。绿川英子热爱她的工作，她每天站在抗战中国的麦克风前，用流畅的日语，向自己的同胞揭露日军的罪恶，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斗的事迹。她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钢刀，刺向日本统治者的咽喉，使他们手足无措，惊恐万状。

当时朝鲜诗人王子天，被绿川英子的言行所感动，写了一首叫作《和平鸽》的诗，赞美她说：

如今你站在麦克风前开始翻译，播音，  
向你的同胞把真理预言。  
你那尽管温柔的嗓音，  
却足以制造电闪雷鸣。  
你句句金玉献给仍有良知的心灵。  
你的声音是不会白费的呵，  
因为它定能将那喝血入迷、制造痛苦的狼心  
打得粉碎，撕得干净。

绿川英子的对日广播，确有成效。如原日军侵华部队华中派遣军某部通信兵堀锐之助，曾写下短诗，表达听此广播后的激动心情：

重庆广播，  
偷偷倾听，  
那流畅的日语，  
心中难以平静。<sup>①</sup>

日军侵占汉口后，才探知那对日广播员是长谷川照子。1938年11月1日，日本东京的《都新闻》，以头版显著标题，刊登有关此

---

① 大岛义夫、宫本正男：《反体制世界语运动史》，日本三省堂1974年版。

事的报道,攻击绿川英子:“用流畅的日语,恶毒地对祖国作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原来是赤色败类长谷川照子。”该报同时登了她的照片。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竟寄恐吓信给绿川英子的父母长谷川幸之助,要他“引咎自杀”。但日本反战人士对此却有着完全相反的看法,如日本女作家洋地久说:“照子被扣上‘卖国贼’的名字,这是任何日本人也得不到的勋章。”<sup>①</sup>

绿川英子在汉口积极从事反战工作。1938年7月29日,汉口举行茶话会,欢迎英国女作家阿特丽——《日本的泥足》一书的作者,老舍、邵力子、胡秋原、盛成、胡风、白薇、绿川英子等30人出席。绿川英子用世界语讲话:“我希望中日英三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绿川英子还在汉口会见了东北抗日英雄赵老太太,并在《抗战文艺》1938年8月13日第2卷第4期上发表了《赵老太太会见记》一文。在文中她记叙了赵老太太代表的中国人民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认识:“侵略中国的只是一部分日本人。”这对于绿川英子是很大的安慰。

绿川英子在《新华日报》1938年8月20日第3版上,发表了《日本朋友慰劳信》,其中写道:

亲爱的中国士兵们:

首先我向你们拿自己的血肉来保卫中华民族的英雄们,致诚实的敬礼。我老想到前方去,同你们在一块儿拼命的斗争,好打倒侵略者……假使我有百个身体,要到前方的日本军队去,同他们好好谈一谈,不让他们再杀中国兄弟、中国老百姓;假使我有千只手,要到所有战线去,给中国士兵绷一绷受伤的地方,替他们洗一洗衣服。但可惜得很,我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两只手,只有留在汉口,帮你们做点后方的事情。但,我努力做下去,因为这也是必要的……日本军队不过是持较优良的武器,可是,这种武器赶不上你们的勇敢,更赶不上你们的团结,因为他们没有正当的理由打仗……你们无情的、顽强的打下去吧!我也在后方

---

① 戈宝权:《忆中国人民的战友——绿川英子》,载《光明日报》1980年5月26日。

用一切方法来支持抗战。

绿川英子的这封充满诚挚感情的信，充分表达了她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赞扬，和她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决心。

### 三 在重庆的反战活动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绿川英子随国民政府机关撤出，12月到达重庆。刚到重庆时，她继续在国际宣传处工作，同时，努力参加进步的文化界、文艺界的抗战活动，为《新华日报》写稿，协助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的编辑工作。这时，她身体虽然不很好，但仍积极参加各种集会，勤奋写作、翻译。她在中国的反战活动进入了最活跃时期。

1938年12月17日，她刚到重庆，就为《新华日报》举行的义卖活动写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出钱》一文。文中提出：“现在中国香港工人发起义卖运动，扩大到全中国的规模，这是中国人民救国的一个伟大的运动。这运动是与日本的根本不同的。请你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能够用钱挽救患难中的中国的父母兄弟，难道谁不愿意买点东西给他们呢？甚么人不愿出钱呢？”同月29日，她在《新华日报》纪念世界语创建者柴门霍夫80诞辰的特刊中，发表了《致全世界世界语者同志》的信。信中说：“我永不怀疑，即使没有外援，不管困难有多大，中国定将继续抗战下去，并获得最后胜利。然而援助中国是所有国家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义务，因为中华民族不只为自身的解放而战，也是为人类的和平而战。”她请求各国世界语者做到：“督促贵国人民和政府实行国际联盟条约第16条”；“要求贵国政府绝对禁止出口军需品给日本”；“不要买，而且劝别人也不要买日本货”；“号召贵国人民捐助医药、其他必需品和金钱给中国。”

绿川英子号召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战的同时，也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给中日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1939年8月，她在《代用品时代——战时日本风俗画》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天,我弟弟从华中前线写信给我们。信里写道:‘近来从日本寄来的信件,却湿得连字迹都认不出来了。难道现在军事运输办得这样糟吗?’我这样答复他:‘亲爱的弟弟,在你的祖国,人们除了眼泪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在外打仗的你们了。现在,其他一切东西都贵得可怕,眼泪却越来越不值钱了。绝望地望着西方,妻子们哭着,孩子们哭着,母亲们哭着,那新出现的女邮差们也为他们永不回来的丈夫而哭着,甚至邮箱也哭着。对啦,亲爱的弟弟,你还不知道,在日本有十万多只邮箱,其中两万只是铁做的。一个月之前人们把这铁做的拿走而代之以别种材料的。这批新的邮箱很不结实,只要稍微下几滴雨,它们立刻就哭起来了。我们放在里面的信件,就更潮湿了。亲爱的弟弟,你要记住,在日本,只有两万只邮箱在哭泣,而在中国,那两万只旧的都已经化作子弹,而使无辜的邻人哭泣了……’<sup>①</sup>

1940年7月,在华日本人反战革命同盟总部成立大会在重庆召开。绿川英子出席了这个重要会议,并在会上被选为该总部教育宣传部的负责人。1941年8月24日,反战同盟被军委会政治部解散。同年夏季,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改组,郭沫若被免去厅长职务。经过周恩来巧妙斗争,在政治部下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安排从第三厅退出来的一批文化名人,由郭沫若任该委员会主任。随之,绿川英子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转入这个委员会的第三组,即“对敌宣传与敌情研究组”工作。

1941年7月27日,重庆文化界为纪念郭沫若回国四周年,文化工作委员会举行小型庆祝晚会和聚餐。周恩来、邓颖超亲临会场,绿川英子、鹿地亘、池田幸子和几位日本反战同盟盟员也应邀参加。聚会时,周恩来握着绿川英子的手说:“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绿川英子回答说:“这对我是最大的鼓励,也是对我的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最高酬答。我愿做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的女儿。”席间,周恩来提议:“为在座的绿川英子和鹿地亘等日本朋友干杯!”

---

① 载《中国报导》1939年第4期。



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植耘,有把白色折扇,他请文工委的战友们在上面签名。邓颖超特意把她的名字签在绿川英子名字旁边,签完后,对绿川英子说:“我们并肩作战!”绿川英子被感动得泪满眼眶,双手紧握邓颖超的手。

1941年还是绿川英子写作、翻译的丰收年。这一年,她出版了包括《爱与憎》等15篇文章的文集——《暴风雨中的细语》;用世界语翻译了日本作家石川达三揭露日军暴行的小说《活着的士兵》,并由中国报导社出版。

绿川英子在从事反战活动的过程中,还与她的中国朋友建立了亲密关系。1941年11月16日,为纪念郭沫若诞辰50周年和创作活动25周年,绿川英子为《新华日报》纪念特集撰写《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一文,对郭沫若表示祝贺。同一天,郭沫若在绿川英子从日本带来的一块两尺见方的红绢上,写了一首诗,诗文是:“茫茫四野弥黧<sup>闾</sup>历历群星丽九天。映雪终嫌光太远,照书还喜一灯妍。”这块有郭沫若题词的红绢,直到今天,还由绿川英子的子女刘星、刘晓兰,当作无比珍贵的宝物用心保存着。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仅几天,绿川英子就于12月15日写作,由她和鹿地亘、池田幸子、青山和夫共同署名,发表了就太平洋战争爆发所作的反战宣言。

宣言指出:“太平洋大战已经爆发,法西斯恶棍们现在在整个地球上张开了魔爪。史无前例的灾难,人类文明和幸福的危机威胁着我们。现在正是全人类必须用火与铁一般的战斗意志联合起来,勇敢地粉碎和消灭那些可恶的共同敌人而斗争的时刻。”向世界反法西斯的战友表示:“我们日本人民以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向你们伸出双手。我们毫不犹豫地向你们声明:我们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是属于你们的……我们和你们在一起将为彻底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而战斗到底。”宣言号召:“联合起来,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上战斗着的亲爱的弟兄们!”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绿川英子还发表了《中日两国妇女携起

手来》、《她们在战斗中前进》、《青年时代的柴门霍夫》、《目前日本妇女的生活》、《忆肖红》、《志愿囚徒》、《解放是要争取的》、《如何学习》、《民主世界的不幸》等生动优秀的反战作品。

1944年3月15日,是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成立4周年。这个由叶籁士等人创建的学社,先后共培养了2000多名学生,他们遍及全国18个省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学社还出版过一些世界语进步文艺书籍,这对于推动当时的世界语运动和抗日宣传工作,起了一定作用。对此,董必武、郭沫若曾给以赞扬。绿川英子参加了纪念会,并讲话和题词。她的题词是:“我们世界语的道路,永远和革命事业分不开的。当革命艰辛时,我们正走着崎岖的路,当革命成功来到的日子,我们的言语就要开花,它的前途是与革命一样光明。今天我们正走在崎岖的路上,更要坚持下去,不论四年、四十年,或者更久,不断地培养与成就,就是未来的收获的保证。”

1944年,军委会政治部作出了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决定。4月1日,在重庆天官府街7号,举行了文化工作委员会最后一次集会。除文委会全体人员外,重庆文化界著名人士,包括绿川英子、刘仁等,都参加了。郭沫若在这次集会签名轴上的题词是:“昙华林纪念,始于今天,终于今天,憎恨法西斯,勿忘今天。”<sup>①</sup>它给绿川英子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44年下半年,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绿川英子、刘仁两人,转到高崇民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亡总会”工作,担任该会机关刊物《反攻》(半月刊)的编辑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坚持八年抗战的中国人民胜利了。这时绿川英子、刘仁参加了“东北民主政治协会”。8月20日前后,高崇民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东北籍的干部迅速返回东北,开展工作,青年干部先离开重庆;绿川英子夫妇暂留重庆,把《反攻》半月刊,坚持到9月18日——九一八事变

---

① 政治部第三厅于1938年4月1日成立于武昌昙华林,到1944年4月1日,前后正好整整七年。

十五周年纪念日——停刊后,再行北上。

日本的投降,引起了绿川英子的沉思,作为一个真正爱国的日本人,她十分关心今后日本的命运。1945年9月13日,她在《新华日报》发表了《在歧路上的日本》一文,流露出她对日本前途的忧思和对民主与和平的日本的向往。她指出:“日本法西斯根本不承认中日战争的失败。请看,8月15日日皇的敕书,铃木内阁的文告,都仅仅是提出将近四年的‘大东亚战争’。他们抹杀八年来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大血债。他们又把‘中日合作’‘中日亲善’的法宝拿出来了。中国人民还允许甜蜜的谎言来掩住血淋淋的事实吗?我们要揭露这种阴谋,我们要打破这种阴谋。我们所要的,不是暂时的,而是永久的和平。我们不要‘反布尔塞维克’堡垒的日本,我们要民主的日本。我们要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我们拒绝它的人物、制度、军队、经济、思想等一切的一切。天皇问题让日本人民自己来决定——这在原则上是对的。可是,天皇的独裁权还在,以他为中心的统治机构一点也没动的时候,请问,日本人民哪有存废天皇的自由。”绿川英子战后不久,就提出上述见解,应该说她是具有一定政治远见的。

#### 四 最后的归宿

1945年11月,绿川英子夫妇由重庆到达武汉;1946年2月到达沈阳;同年冬天到达解放区哈尔滨,绿川英子担任了东北教育委员会委员。1947年1月,她被任命为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研究员。后因战火迫近,绿川英子一家人,随后方留守处撤退到佳木斯。在佳木斯,绿川英子被聘去东北大学讲课,由刘仁作翻译。

这时候绿川英子发现自己有了身孕,觉得这会影响工作,决定作人工流产手术。不料她在手术中被刮破子宫,引起感染,由于当时缺少药物,她病情很快恶化。1947年1月10日,35岁的绿川英子,在中国的大地上结束了她的生命旅程。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

人民政府,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刘仁陷入极度痛苦,在绿川英子逝世后的第100天,他也因疾病和悲痛离世。绿川英子夫妇的遗体,都安葬在佳木斯烈士陵园。绿川英子的墓号为244,刘仁的墓号为198。

中国人民永远深深怀念绿川英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大报刊上陆续发表了大量纪念她的文章。日本人民永远思念绿川英子。早在1953年,就在日本出版了她的《在战斗的中国》、《暴风雨中的细语》等著作。1980年,日本剧作家岩间芳树写成纪念绿川英子的电视剧《望乡之星》,并拍成第一部中日合作的,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电视片。1980年前,大阪府柏原市成立了长谷川照子纪念协会,出版刊物《绿色的五月》,刊登研究绿川英子生平事迹和作品的文章。绿川英子的反战事迹,将永远铭记在中日两国人民心中。

(作者单位:孙金科,江苏省赣榆县政协委员会。

于景鸿,赣榆县广播电视大学)